

“一国两制”新篇章 ——重新思考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定位

强世功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要：唯有从地缘空间格局和宏观历史视野出发，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地位。香港处在“文明互鉴带”或“文明融合带”上，因此，它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定位不仅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国文明向外发挥影响的“跳板”。今天，认识香港的重要性，不仅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经济战略定位，还要开启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新定位，香港是我们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绝佳训练场；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是要香港发挥其内地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其国际地位。

关键词：香港；一国两制；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 (2022) 06-0114-06

2008 年以后香港政局出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一方面，随着 2007 年中央给出关于香港普选“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决定，围绕普选的政治争论和分歧更加激烈，社会撕裂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随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国际上标志着“中国崛起”，美国也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强化对中国崛起的遏制，而香港恰恰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支点。在这种背景下，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兴起并发展到“港独”思潮的蔓延，从 2014 年“占领中环”的“雨伞革命”一直到 2019 年“修例风波”演变为暴乱，“一国两制”遭受严峻考验。在中美全球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在经受住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之后，在香港问题上主动承担起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宪制责任。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国安法，2021 年全国人大又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在宪制层面上完善了“一国两制”，从而实现了香港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折。2021 年 7 月 1 日，在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节点上，习近平主席在纪念香港回归 25 周年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将香港纳入整个中华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历史叙事中，郑重宣布“一

收稿日期：2022-08-31

作者简介：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国两制”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在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而且进一步强调“保持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可以说，提出“两个长期”（“长期坚持”和“长期不变”）是自邓小平宣布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进一步就“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做出的政治承诺。这一庄严的政治承诺不仅是为了平息2019年以来因香港变局引发对“一国两制”是否可持续的纷争和怀疑，更重要的是宣示“一国两制”将成为一项长期的国策。我们唯有从地缘空间格局和宏观历史视野出发，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独特定位。

一、新边疆：“断裂带”与“融合带”

从香港所处的地缘空间看，香港地处麦金德所说的“内新月地带”与“外新月（岛屿）地带”或东亚大陆边缘地带与海洋世界之间过渡地带，处在中国大陆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南洋世界乃至西洋世界沟通的要道上。如果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古代中国的华夏中原向江南扩展形成了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围绕这个中心地区形成两个边疆地带。一个就是从春秋战国以来为了应对马背民族游牧生活方式的冲击，围绕“长城地带”而形成的历史上的西北边疆；另一个就是从宋明特别是晚清以来为了应对来自海洋的、以商船炮舰为代表的工商业生活方式的冲击，围绕琉球、台湾、香港、澳门乃至南洋地区形成的东南新边疆。我们唯有从西北大陆边疆、中心华夏区域与东南海洋边疆的三分地理格局以及草原游牧、农耕定居和海洋商业乃至工业三种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才能理解中国历史演化与兴衰的命运。

如果我们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那么，从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发展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历史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三种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文明从简单体系向复杂体系不断演化，以至于三者处在不同的维度上，后者往往对于前者构成降维打击。由此，尽管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军事机动力量和冲击力，甚至在军事上摧毁农耕民族建立的王朝，但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不得不接受农耕民族建立起来的复杂的文明体系，甚至推动中原农耕生活方式所建立起的文明体系向边疆游牧地区扩张。由此，我们看到恰恰是元代和清代两个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才将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疆的“长城地带”纳入中华文明的内地版图，从而将中国文明的边疆大幅度向外扩张，以至于才有今天的“新疆”这个概念，比较之下过去的“长城地带”就变成了“旧疆”。正因为中国将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以至于宋明以来，中国不但主导着东南沿海的海洋贸易，并将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发展为一种全球贸易的世界经济体系——白银资本体系。然而，随着欧洲通过加入东亚贸易体系，从而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飞跃，这种新型的工商业文明就对农业文明构成降维打击。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甚至处于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日本在经过工业化提升后，都可以对中华文明构成降维打击。而香港就处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冲突和交融的地带上。如果从亨廷顿的观点看，台港澳地区毫无疑问处在“文明冲突”的“断裂带”上，中西方文明的较量必然在这里引起惊涛骇浪。从鸦片战争、

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香港始终处在文明冲突的前线，香港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放在“文明冲突”的理论范式中来理解。最近一些年从“占领中环”的“颜色革命”到“修例风波”引发暴乱以及西方对香港的制裁，无疑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部分，而在美国的主流话语中，当下的中美竞争和较量要么被看作“新冷战”，要么被看作“文明冲突”。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面对这场冲突较量，中央为什么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不移支持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坚定不移支持爱国者治港，通过国安立法和选举法修改来稳定香港政治秩序。这使得“一国两制”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航向，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推动“一国两制”开出“由治及兴”的新篇章。

然而，文明之间不仅有冲突的一面，我们更应该看到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一面。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的重要讲话中之所以郑重宣布“一国两制”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中华文明传统中虽然强调文明差异的“华夷之辩”，但并没有“文明冲突论”，相反我们始终坚持文明共存、相互借鉴的“文明互鉴论”，就像历史上中华文明不断与边疆少数民族在互动中相互学习、不断发展壮大一样。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独特的地缘战略意义并非它是处在“文明断裂带”上，而是因为它处在“文明互鉴带”或“文明融合带”上。中国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来对待外来文明，始终以主人的心态择善而从，为我所用，从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壮大自己。中国文化不仅成功吸纳融合了来自印度的佛教，也在不断消化和吸纳西方文明的有益要素，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中央相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作出重大贡献。”由此，香港作为中国的“新边疆”，在国家战略这个格局中的重要定位不仅是我们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国文明向外发挥影响的“跳板”。

二、“窗口”与“跳板”：香港的经济与政治定位

从文明借鉴和融合的角度看，香港处在文明融合带上，既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窗口”，也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跳板”。比如宋明之际，中国文明会将东南沿海的新边疆作为对南洋地区施加影响的“跳板”，而欧洲耶稣会士来华则将港澳地区既作为了解中国文明的“窗口”，也作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跳板”。鸦片战争以来，香港从一个荒蛮小岛变成了一个繁华的现代商业城市，以最直观的方式将西方文明的外貌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它对中国人产生的冲击效果乃至学习效果远远超过文字阅读所产生的想象。由此，香港一方面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跳板”，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进而学习西方文明的“窗口”。从早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创办媒体传播西方文化推动中国改良变法的王韬，从以香港作为基地来发动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到将香港作为积蓄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的香港始终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知识、文化并探索救亡图存道理的启蒙学校，始终是

中国人推动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的刺激力量。由此，香港及其背后的鸦片战争，在中国的话语叙述中：一方面，在文明冲突背景下成为中国文明被西方文明打败的屈辱历史的开端；另一方面，在文明融合背景下成为中国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起点，乃至成为中国文明保持开放、吸纳其他文明推动自我更新、自我成长的符号象征。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中国共产党秉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立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却始终坚持暂时不收回港澳地区，继续保留香港和澳门的殖民统治，甚至为此遭受到苏联的批评和指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确立了“保持不变，充分利用”政策，充分发挥香港在“文明交融带”上的独特地缘优势，充分利用香港与西方资本主义融为一体的优势，将香港作为中国获取西方资金、技术、物资和信息的“通道”，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面对香港回归的政治主题，中央之所以采取“一国两制”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关键在于处理好国家主权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关系，尽最大可能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继续利用香港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紧密联系，发挥其引进西方资金、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并便捷地向全球输出中国产品的“通道”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一方面在于其地处“文明融合带”的独特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就在于国家战略定位不断巩固和成就其优势地位。然而，香港在国家战略定位中除了发挥其经济优势外，还曾经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近代以来的民主革命，无论是国民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将香港作为革命的基地。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美苏争霸在全球推行的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中国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进步革命力量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浪潮。而这场革命运动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也激发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使得全球进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岁月。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爆发的“六七反英抗议”运动就与东南亚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相互配合，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地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发展。

随着世界革命浪潮的衰退，全球保守主义回潮，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相互推动，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不断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我们逐渐掌握了驾驭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深圳、广州、上海等内地城市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中已经超过了香港甚至和香港形成了竞争。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窗口”地位不断下降，而香港又面临自身的经济问题，需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从中央推出的 CEPA 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规划，推动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融合不仅是利用内地的资源来支撑香港的发展，更是利用香港的优势来带动内地的发展，不仅要“走进来”而且要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去”。

随着香港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变化，香港在国家战略中的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越来越凸显。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从本土向全球延伸，中国需要全球的资源 and 市场，世界也需要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成为推动全球化最强有力的力量。然而，经济发展始终需要政治的保护，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一个有利的全球政治环境，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全球治理进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

任，必须成为国际秩序“责任承担者”(stake holder)。由此，中国不仅要具有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能力，而且要具有掌握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采取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属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体，而且目前的全球秩序也是在这个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就不可能像当年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那样，将自己的国内制度强行推向全球。而只能在保持中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全球治理中学会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舆论环境下掌握国际话语权。这对于不断崛起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项必须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就像改革开放之初面临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难题一样。

三、“两个建设好”与“双循环”：香港的政治与文化定位

如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善用香港的“一国两制”，“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与英美普通法体系衔接的香港普通法体系、自由开放的舆论环境等，就不能看作是香港治理中的“负资产”，它实际上为我们学习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体系提供了绝佳的训练场，这无疑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服务国家战略的最独特的贡献。这就意味着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经济战略定位转向双重定位，不仅强调其经济战略定位，而且要开启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新定位。唯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两个建设好”的伟大号召，即中国共产党“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要把资本主义的香港治理好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内地治理社会主义的方法来治理港澳的资本主义，不能用内地的举国体制来应对香港的竞争性选举，不能用内地的党的领导体制来解决香港的司法复核问题，不能用内地的宣传体制引导香港的舆论走向，而必须用香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来解决香港问题，“用香港行得通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系统研究、虚心学习和探索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文教体系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观念、知识和方法来展开全球治理，而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和文教体系。

在这种全新的战略定位中，香港的重要意义不仅为我们驾驭资本主义制度积累了知识、经验和技巧，更重要的是为中央培养储蓄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管治经验的新型治理团队，包括政治人才、选举人才、法律人才和传媒人才，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驾驭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人才储备和经验储备。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定位就不仅仅是国际经济中心，而应利用香港的普通法优势推动其成为国际商业仲裁中心、国际司法中心，与此同时，应当充分利用香港不同文化交流的自由舆论环境，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传媒中心、国际文化翻译出版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与会展中心。更重要的是，要利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推动香港精英人才积极参与到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事务中，使其成为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阶梯。

香港在地缘格局中的重要优势在于其毗邻的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中国东南沿海海外移民的重要区域。香港与这些地区的华人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网络优势。我们可以通过香港使得海外华人群体成为中国发展海外关系并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要推动海外华人成为积极落实 RECP 的政治和商业力量,推动海外华人成为团结各国进步力量并与中国建构良好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从而共同推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区域治理典范,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累经验。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绝不能将香港内地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其所具有的而内地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由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是着眼于将港澳地区整合在内地经济体系中,实现“内循环”,更重要的是,要用港澳的国际化标准来推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实施更大范围的开放,从而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力量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的“外循环”,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外循环”,而且是包括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外循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而这种更高水平的新型改革开放必然要求香港、澳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发挥香港、澳门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澳门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在这两句话中,中央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提升”港澳的国际地位,然后才是港澳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如果从这个战略高度看,那么,“两个建设好”战略和“双循环”发展格局就会逐步建构起一个内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外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世界体系。这既不同于当年苏联在全球推广共产主义的体系,也不同于当前美国以“历史终结”为目标推进建设的世界帝国体系,而是将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在文明共存、文明互鉴基础上,推动古典天下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由此,香港不仅是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从而推动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通道,也是推动中国文明从大陆迈向海洋惠及更广大区域的跳板,就像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所推动形成的东方贸易圈或早期全球化一样。香港不仅是展现给台湾的“一国两制”样板,也是我们巩固东盟的基础,更是我们透过东盟与大洋洲、印度洋地区、伊斯兰地区建立互惠互信、合作共赢关系的纽带。若能善用香港发达的商业、市民社会和文化这些“社会性力量”,善用香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则香港也可以成为中国联动整个世界的支点。

责任编辑:杨 东